

●西●方●哲●学●研●究●翻●译●丛●书●

# 理性的毁灭

〔匈〕卢卡奇 著

王玖兴等 译



山东人民出版社

〔匈〕 卢卡奇 著  
王玖兴 程志民 谢维和 译  
谢地坤 宋祖良

## 理性的毁灭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西方哲学史研究室  
《西方哲学研究翻译丛书》编委会编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7年·济南

山东省版权局  
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图字：15-97-01号

## DIE ZERSTÖRUNG DER VERNUNFT

Georg Lukács

(C) Ferenc Jánossy legal successor of Georg Lukács  
Az ész trónfosztása Budapest Akadémiai 1954  
Die Zerstörung der Vernunft Luchterhand 1962

本书经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代理，由Ferenc Jánossy授权山东人民出版社独家享有该书的汉语翻译专有权、印刷出版专有权，以及向世界各地发行的专有权。

### 理性的毁灭

非理性主义的道路——从谢林到希特勒

〔匈〕卢卡奇著

王玖兴等 译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政编码：250001)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24.75印张 2插页 595千字

1997年5月第1版 1997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209-00121-2  
B·15 定价：28.00元

**编委会名单**(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玖兴	王克迅	王树人	叶秀山	傅乐安	汝 信
汪子嵩	李泽厚	何兆武	李金声	余丽嫦	陈启伟
侯鸿勋	高 崧	钟宇人	梁存秀	涂纪亮	管世滨
薛 华					

**顾问:**

贺 麟      洪 谦      杨一之      温锡增

## 《西方哲学研究翻译丛书》前言

研究西方的哲学思想，首先当然要钻研原著，对历代诸家提出我们自己的理解和诠释来；但为了丰富我们自己的见解，使这些见解有充分的历史和学术的根据，我们不能忽视西方人历来对这些著作的研究成果，我们必需参考别人的理解来形成、提出自己的见解。

对原著的诠释有两种情形。一种是思想家对思想家的诠释，譬如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诠释，黑格尔对康德的诠释，海德格尔对胡塞尔的诠释，这当然是最为重要的，但这种诠释自身已成为创造性思想的一个组成部份，这种著作自身也成了“原著”；还有一种诠释是学术性的、专门性的，它们或注重范畴之演变、逻辑结构之分析，或注重社会、历史背景之介绍，或侧重学说思想之渊源……，是一种科学性、历史性、理论性的专门研究成果。这些专门家的研究成果同样是我们研究西方哲学思想必不可少的书籍。譬如研究古代希腊哲学自不能不读蔡勒的书，研究中世纪哲学也不能置基尔松的史作于不顾。

就我国西方哲学研究近几十年的情况来看，我们对于西方古典哲学原著的翻译介绍还是比较重视的，但对于研究这些原著的专门性学术著作翻译、介绍得就很不够。为了弥补这方面的空白，我们特编选了这套《西方哲学研究翻译丛书》。

本丛书所选著作，都是我们认为在研究某方面原著时必读的参考书。这些书的学术价值是公认的，在西方也是多次再版、一印再印的，因此在中译译文方面，我们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希望能和原著的翻译一样，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我们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将对我国西方哲学研究在学术方

面的提高有所帮助。真正的思想家的著作都是启发人去思考、去探索的，对他们的著作发表“意见”并不太困难，但要使自己的“意见”言之有根、言之成理，使自己的思想不仅有“独特性”，而且有“训练”、有“教养”，使自己的思想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前进，就需要做一番扎实的科学研究的功夫。任何独创性的思想家的思想都是“有根”、“有据”的，我们在理解、诠释、批评他们时也要使自己的思想“有根”、“有据”，所以我们应该研读这些公认的学术性强的研究著作，以提高、丰富我们自己的见解。

山东人民出版社的同志支持我们的想法，不惜工本来承印这套丛书，我们以繁荣学术事业的名义来感谢他们的帮助。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西方  
哲学史研究室  
《西方哲学研究翻译丛书》编委会

## 译者引言

本书作者乔治·卢卡奇 (Georg Lukacs, 1885—1971 年) 是二十世纪最著名最有影响而且争议最多的思想家之一。他在半个多世纪的理论工作中, 对哲学、美学、文艺批评等许多领域写出了大量属于人类文化遗产的论著。《理性的毁灭》这本书, 同他在先前几年发表的《青年黑格尔》一起, 是他在哲学史方面所写的为数不多然而极其重要的书。书成于五十年代初期。当时的西德, 在战败的废墟上, 存在着威胁全体人类前途的法西斯主义死灰复燃的危险。他不能熟视无睹, 为此他追溯了一个多世纪以来对这股反动思潮有过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影响的一些重要德国思想流派, 并对其进行了分析批判。这部著作除史料宏富和见解深邃之外, 特别反映出作者强烈的时代责任感。

卢卡奇生活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面对着时代的奔腾湍激, 他作为紧摸着时代脉搏的思想家, 并不限于埋头从事理论探索, 而且也直接投身于现实的政治斗争。他对他的祖国匈牙利的历史进程, 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都曾起过显著的作用。因而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 也都犯过有时过于激进有时又跟不上时代步伐的失误, 这是大家熟知的。《理性的毁灭》, 应该也不能属于例外。不过, 他善于不断地从失误中吸取教训, 从而提高自己, 丰富自己, 继续前进。新近有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评论说: “他思想上的完美性是不容置疑的。”毫无疑问, 这里所说他的完美的思想, 并不是指他不断发展中的理论观点而言, 毋宁是要强调他一生追求真理、争取

人类进步的每一行动，其思想动机都是忠诚无私的。

卢卡奇也象许多资本主义后期的进步思想家一样，是从没落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摆脱出来，发展转变成为一位卓越马克思主义者的。可是他和他们的大多数又颇不相同，不同之处至少有两点可以指出。一点是，当他是资产阶级思想家的時候，他不仅仅是晚期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个一般的传播者、代言人，而是当时某些重要思想流派的基本思想方式的首倡人、始作俑者。比如说，他的早期著作《长篇小说的理论》对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尔诺的思想的暗中启迪，以及被认为已是马克思主义论著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同存在主义者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的呼应关系，都是一再有人论述过了的。正因为他的早期思想原本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个结结实实的组成部分，所以他后来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在一定意义上乃是对他自己过去的清算，从而更能鞭辟入里，切中要害。在《理性的毁灭》里就有这种情况。

另外一点是，对于马克思主义，他是一个不能满足于仅仅接受和继承其基本论点而已的人。作为不懈的真理追求者，他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力图发展、深化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而且事实上他以其不断的斗争实践为根据，他确实也这样做了。这项工作做得怎样，虽然生前就引起激烈的争论，无疑还有待于实事求是的研究，才能弄清究竟有多少是错了的，多少是真正的成绩。西方有些学者高喊什么“二十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高成就”，“现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典范”，等等，我们暂且不去管它，值得注意的是，在多次严肃批判过他的苏联，在他死后，也已郑重表示：“苏联的哲学家们将永远记住乔治·卢卡奇这位杰出的学者和思想家对世界文化、哲学的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

对于这样一位作者，本书读者肯定也不陌生。不过，如果



在开始阅读本书正文之前，先和我们一起简略重温一下他的生平、著作和主要观点，仍不会完全没有好处。

\*

\*

\*

卢卡奇于1885年4月13日出生于布达佩斯一个富有的犹太家庭。他在全家四个孩子中排行老二。他父亲是匈牙利最大的银行“布达佩斯信托公司”的董事。他家当时是布达佩斯的一个著名沙龙，许多艺术界的文人学士经常是这里的座上客。卢卡奇从小就深受这个文化沙龙的自由探讨气氛的熏陶和感染。

卢卡奇中学毕业后进布达佩斯大学学习法律和国民经济学，后来攻读哲学。1902年至1903年，卢卡奇刚十七八岁，就开始在《匈牙利沙龙》和《未来》杂志上发表戏剧评论文章。1906年到柏林学习。同年10月，在科罗茨瓦获法律博士学位。1908年2月，卢卡奇发表了《现代戏剧发展史》一书，获克里斯蒂娜奖金。这时，他初次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后来在《我走向马克思的道路》一文中他说：“这一学习，使我确信马克思主义几个核心观点的正确性。给我印象最深刻的首先是剩余价值理论，历史是阶级斗争的观点，以及社会阶级划分的观点。显然，对于一个资产阶级分子，这种影响只限于经济学特别是社会学方面。”

1909年卢卡奇以《戏剧的形式》一文在布达佩斯大学又获哲学博士学位。1913年后，卢卡奇到海德堡大学和佛赖堡大学等地继续深造。他的动荡生活，给他此时的理论著作带来一定的特点，那就是他所有的前马克思主义和早期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著作，大都是在几年内写的论文或准备写作的较大部头著作的一些片断的汇编。例如，《心灵和形式》是1910—1911年间所写并曾于《西方》杂志上陆续发表的；《海德堡艺术哲学》写于1912—1914年间；《长篇小说的理论》写于1914—1915年间；《美学》写于1916—1917年间。

卢卡奇在其理论活动的这一时期里，总的说来是处于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之下的。最初是狄尔泰和席美尔的“生命哲学”，后来还有李凯尔特和韦伯的新康德主义社会学。可是他很快就接受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所以，他自己承认那时他研究马克思的著作，是通过黑格尔的眼光来看马克思的。

1915年卢卡奇返回布达佩斯，对匈牙利的现实深感不满，不久就成了进步知识界的瞩目人物。1918年12月，卢卡奇加入了匈牙利共产党，并在1919年3月21日成立，同年8月1日覆灭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中，担任副教育人民委员和匈牙利红军第五师团的政委。匈牙利革命失败后，卢卡奇在布达佩斯作了几周地下工作，然后流亡到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在维也纳，卢卡奇参与主编《共产主义》杂志。由于受工团主义思潮的影响，他主张同来自资产阶级世界的一切制度和生活方式全面决裂。1920年卢卡奇发表了《论议会制问题》一文，持左倾激进的反议会的观点，表现出一种“救世主式的宗派主义”。为此，受到列宁的严肃批评，说他只在口头上挂着马克思主义，缺乏对特定的历史情况的具体分析，不懂得革命最重要的事情在于夺取资产阶级借以影响群众的一切部门和机构。这次批评对卢卡奇的震动很大，他事后说过，列宁对他的批评是他的世界观真正转变的开始。

1923年，卢卡奇把他在十月革命之后四年内所写的八篇论文汇集成书，以《历史和阶级意识》为题发表。这部著作是卢卡奇理论探讨工作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书中试图探索一种能避免教条主义和所谓极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了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经济的和自然的唯物主义等同起来的倾向，坚决反对哲学中的直观主义和机械主义，提出关于能动的个性和表现出介入态度的人的概念，高扬了主观能动性和人道主义的价值和意义，并对商品拜物教、物化现象和辩证法进行深入的分

析。同时还对恩格斯作了错误的评价，否定自然辩证法和反映论，自认为这是用“真正的马克思”思想来解释马克思主义。

《历史和阶级意识》发表以后，立即受到西方哲学家的热烈赞扬，也遭到共产国际的严厉批判，并因此被逐出《共产主义》编辑部。但卢卡奇并没有停止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1924年，卢卡奇发表了纪念列宁逝世的文章《论列宁的思想体系》，高度赞扬了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1925年还发表了评论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文章等等。

1928年，卢卡奇受匈牙利党中央委托，起草匈牙利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匈牙利政治和经济形势以及关于匈牙利共产党任务的纲领》，即通常所说的《勃鲁姆提纲》。在提纲中，卢卡奇把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民主专政看作是由资产阶级革命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典型形式，从而克服了他早期的左倾观点。同时他还提出了在国际工人运动中争取人民阵线同盟军的思想。不料匈牙利党内和共产国际对这个提纲都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斥之为“取消主义”。他为此发表了一个自我批评，表示承认提纲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这次事件大大影响了卢卡奇的生活历程，自那以后，有一段时间他停止了积极的政治活动，全力从事于理论研究。

1929年卢卡奇到了莫斯科，在马恩研究院工作。在那里，他有机会研究了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其他没有公开发表的马克思的早期著作。这一研究工作和苏联哲学界1929—1930年对德波林学派的批判，给卢卡奇以深刻的印象，他后来说过，这一切使他弄清了马克思同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关系以及马克思同列宁的关系，为他的哲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他在这时写成的《马克思、恩格斯与拉萨尔之间关于济金根的论争》（1913年），产生了巨大的反响，他因此被人们公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

从1931年起，卢卡奇侨居柏林，那里是法西斯的巢穴。在这段时间，他发表了《党性倾向》等一系列文章和哲学论文，意在唤起德国进步知识界参加反对日益迫近的法西斯威胁的斗争。

1933年，希特勒夺取政权后，卢卡奇再度移居苏联，在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一直工作到1944年12月匈牙利解放。在这段时间里，他参加了《国际文学》杂志编辑部的工作，深入研究了歌德、席勒、克列斯特、荷尔德林、海涅毕希纳、巴尔扎克和托马斯曼，以及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马卡连柯、肖洛霍夫和高尔基等人的作品。他在这个时期撰写的一系列重要论著，都在战后才陆续发表，主要有：《论现实主义的历史》（俄译本出版于1939年）、《青年黑格尔和资本主义社会问题》（1936年写成，1948年在苏黎世出版）、《艺术和客观真理》（1934年）、《托尔斯泰与现实主义的发展》（1935年）、《歌德及其时代》（1947年）、《存在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1948年）、《德国文学中的进步和反动》（1947年德文版）。

卢卡奇在《青年黑格尔》一书中根据重要的历史和哲学材料研究了青年黑格尔思想发展中的图宾根时期，批判了狄尔泰关于黑格尔早期思想具有神学方向的观点。同时进一步阐明了黑格尔与谢林绝交的历史，分析了《精神现象学》的核心概念——异化。卢卡奇当时得出的结论是：异化在主体方面表现为人与自我意识的虚假同一，而在客体方面异化与对象性是等同的。卢卡奇深刻地揭示了黑格尔成长和发展过程中的矛盾，认为他是他那个时代的进步的资产阶级哲学家，并描述了黑格尔反对非理性主义的斗争。在这一点上，该书预示了卢卡奇的《理性的毁灭》中的许多观点。

1944年12月匈牙利解放后，卢卡奇回国，当选为匈牙利

科学院院士，并在布达佩斯大学任美学、哲学教授。最初几年，卢卡奇又积极参加政治活动，经常就各种政治和文化问题发表看法，提出主张。1949年到1951年期间，卢卡奇曾被看作修正主义分子因而受到批判。此后，他又发表了：《现实主义问题》（1954年）、《美学史论文集》（1954年）和《理性的毁灭》（1955年）。

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卢卡奇积极参与“裴多菲俱乐部”批判斯大林和教条主义的活动，并在纳吉政府中担任文化部长。但当纳吉政府决定退出华沙条约组织时，他坚决反对，因此辞去部长，退出政府。匈牙利事件结束后，卢卡奇于1957年春返回匈牙利，由于参加过纳吉政府，被开除出党，1967年才重新恢复党籍。

本世纪五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是卢卡奇批判地重新评价自己一生活动、总结自己研究成果和争取完成毕生理论事业的岁月。他做了多次重要的自我批判，同时在哲学和美学理论上作了新的探讨。1957年发表了《批判现实主义的当代意义》和《自传补遗》，《马克思主义美学入门》，1963年发表了《美学》的第一卷《审美特征》。在写完《审美特征》之后，卢卡奇决心为马克思主义撰写一部伦理学著作。其三卷本的《社会存在的本体论》是他以抱病之躯奋力疾书的绝笔，但终于没能完成。卢卡奇于1971年6月4日逝世。

卢卡奇所以在垂暮之年仍以完成一部伦理学著作作为自己的使命，是基于他的一个认识。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崇高意愿在于关心人，关心人的价值、尊严及其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命运和前途。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已在他的全部理论和实践中指明了解决的基本原则，只是生前没来得及深入系统地阐述。而如果马克思主义者不及时理解和发展马克思这方面的思想，许多资产阶级代言人就要乘机出来钻空子。在他看来，当代自封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要用人道主义补充马克思主义的存在主义等，都是钻这个空子的。这将造成马克思主义的严重歪曲。所以他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把从本体论上为人际关系奠立根据当成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

卢卡奇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点应该是在本体论，不在认识论。康德以来的认识论，在哲学中占了主要地位，也立下了汗马功劳，把中世纪宗教本体论扫入历史垃圾堆。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不该研究认识论，那是必要的，但在实证主义的强大影响下，避而不探讨本体论，则是一个偏差。他自认在《历史与阶级意识》里否定自然界的辩证法，就是这种偏差的沉痛后果。因为如无存在方面的客观性作为依据，认识方面的辩证法有什么理由能不属于主观的呢？因此他晚年提出的工作口号叫做“回到存在”去。

什么是存在？卢卡奇认为不是现象学派抽掉现象剩余下来的“纯粹存在”，也不能是唯心主义者（例如他着重批判了的黑格尔）所设想的什么精神性的东西，不管是主观精神还是客观精神，都是不可证明的独断论的产物。对他而言，存在就是我们当前现在着的这个运动着的物质世界。物质世界运动发展，由简单而复杂，共有三种逐级上升的存在方式，这就是无机物存在，有机物存在和社会存在。

他认为马克思已经指出，无机物存在的一个基本事实是类和个例（或标本）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任何无机物都是类的一个个例，它经过物理的或化学的作用会发生变化，变成别的东西，但它并没消灭，也永不消灭，这改变了的东西，只是改属于另一个类，它仍然是与类和个例的统一。有机物，就其存在方式而言，是一种由内在力量推动着的综合体，这里出现了生命，它的基本规定是个体的产生和消灭。至于人类社会的存在，在这里当然自然界的一切规律都依旧起作用，但出现了更新的

精神因素、意识。在卢卡奇看来，重要的不在于出现了意识，而在于意识一出现就不是附随现象，不是第二性的东西，它和物质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自始至终参与着社会构成的过程，是社会存在必不可少的创造原则。

意识如何参与社会存在的创造，这可先从人的形成说起。马克思主义早已提出：在人的形成过程中，劳动起着关键作用。卢卡奇认为，劳动是一种目的性活动，不具有某种目的的活动，可以是游戏，也可以是有机的本能反射，但不能算是劳动。所以在生产劳动过程中，劳动者首先要设定目的，比如说，自觉地想取某种东西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当然随后还要选用能够实现这个目的的包括方法和工具在内的手段，甚至要制造适用的工具，但制造工具那又是另一个劳动过程了。从逻辑上讲，设定目的是从事劳动的先决条件，实际上，至少目的设定是与劳动过程同时出现的。因此在卢卡奇看来，在人通过劳动而变成为人的初始，就有目的设定这一意识因素的积极参与。

卢卡奇认为，生产劳动中的目的设定，是人指向自然物的，目的在于创造能满足人的需要的物质。可是劳动实践不断发展，目的设定也能从指向物转而指向人，去影响别人的目的设定。这种以影响别人的目的设定为目的的目的设定，卢卡奇称之为二次性目的设定，也叫做“社会形成的”目的设定，因为正是通过含有这种目的设定的劳动实践，对别人的目的设定施加影响，协调人与人的关系，人的社会才由以形成。所以卢卡奇认为，在社会的形成中，也象对于人的形成一样，意识不是孤立在外或漂浮其上的附随现象，而是从一开始就积极参与其事的创造因素。

人与人的关系，起初很简单，以后逐渐增多，互相协调，终于成为一个交织在一起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就象人的一个

蚕茧，构成人的社会环境。当然随着人的劳动实践的发展，它也继续发展变化，但它在发展变化中却有一定的恒定性，人要进一步改变它，并不那么可以随心所欲。在通常情况下，个人总是适应着它，那就如鱼得水，而有的时候，在发展的转折点上，如果触逆了它，也会象碰上一块石头之类的实物那样，受到它强硬的“回击”。人们看待自然界的的关系，照例把它看作关系者之间的作用，关系者不存在了，关系也就消失了。卢卡奇认为这种关系观即使在自然界里也是不尽适用，更不适用于社会关系。持续存在着的社会关系，带有某种实物性，尤其因为它本来就是人自身物化的结果。

人在劳动实践中，设定了目的，还要选择手段，适用于目的之实现的手段，就被人赋予以价值。例如自然界的石头，本来无所谓有价值或无价值，其中能被用作刀斧的，人就认为它是有用的好东西，赋予了价值。作为自然的人，也不存在有价值无价值的问题，但作为劳动者的人，就有适合不适合于完成劳动目的的差别。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劳动实践中不仅改造了外部世界，也改造着劳动者自身，卢卡奇由此推论，最初，凡按照自然规律从事劳动的人，往往能够达到预期的劳动目的，久而久之，人就锻炼出按自然规律劳动的一些品质，例如细心、认真、毅力，等等。有了这些品质，人就具有了内在价值。人自己赋予自身以价值的。人人都在实践中赋予以价值的个人品质，通过人际关系，成为公认有价值的东西，变成外在的社会风尚、道德规范，等等，卢卡奇把这些称之为二次性精神表现。社会关系和自然界关系的区别之一，就在于社会关系一开始就是有价值的。

在卢卡奇看来，最初出现的价值就只是能直接实现劳动目的的有效用性。实用是价值的基本尺度。不过随着实践的发展，随着实物概念的出现，实用不再总是直接的、具体的，于是产



生出多种间接的抽象的价值，例如科学、伦理、艺术的价值就是这样。在人类发展前史里，各种价值同时实现几乎不可能，甚至彼此互相抵触。迫不得已，人就要在它们之间不断地进行重新评估、抉择和协调，组成一个比较和谐相对独立的精神价值体系。卢卡奇因此曾说，价值发展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历史的异化的过程。这个精神价值体系，按照“类本质”的根本性，则以“人类进步”这一最高价值为其顶峰。

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思想，他自己没能尽其欲言，上述更是语焉不详。不过这里可以看出的几个观点，是在《理性的毁灭》中到处体现着的。

首先，他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用历史发展的原则分析了人类社会这一存在方式的特征，从而给人找到一个至关重要的地位。他阐述了人对社会形成的决定性作用，也指出社会对人的客观制约。人在他的理论中不再是某些自封的人道主义者所说的那样是“无家可归”的弃儿，而是掌握自己命运的主体。

另外，他在生产劳动的目的设定中看到了自由的源头。目的性劳动是人成为人的开始，也是自由的开始，因此自由不是天赋的或获得的社会权利，它自在地就属于人的本质。在人的形成中，自由与必然不是彼此外在的，而是不可分割地互相依存着的。

还有，他还把劳动实践的手段抉择，看作社会发展中的推动作用。他所说的人的抉择并非现代唯心主义所说的仿佛个人遨游于太虚之外的“自我抉择”，相反，它是把自然界的必然规律统统接纳于社会理想之中的。卢卡奇显然坚决信赖理性，能以高度乐观主义精神展望人类的未来。

\* \* \*

《理性的毁灭》这部著作不是卢卡奇的一时即兴之作，而是他思想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更重要的也是他对现实阶级斗争